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辞别的姿态—— 解读黎紫书《告别的年代》

The Way We Say Goodbye:

The Study of Li Zishu's *Gao Bie de Nian Dai* (The Era of Farewell)

Submitted by: 丘 珞 君

Chu Luo Jun (087757C12)

A Final Year Project submitted to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Chinese.

Year of Publication: 2012

感谢

时光荏苒，大一时初到南大报到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如今一转眼就已完成学士毕业论文。曾听说论文写作的痛苦，但在指导老师——李元瑾副教授的细心督导下，我非常享受写作论文的过程，我会想念在老师的办公室里讨论的时刻。除了李老师，也感谢游俊豪助理教授抽空为我改订论文，并给予我宝贵的意见。

感谢我的父母。自小我便深受身为老师的他们的影响，不仅培养我对中华文化的兴趣，也替我打好语言基础。没有父母当年的栽培，就没有现在修读中文系的我，更没有这一篇论文。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女朋友，修读化学的她虽然不了解文学，但书写论文期间，她在精神上给予我极大的支持。

论文的完成，无非是大学阶段的句点，但也是另一个人生阶段的开始。在此由衷感谢四年来曾教导我的老师们。在南大中文系的四年间，让我的视野更开阔，思想更丰富，预备我面对未来的挑战。

最后，感谢上帝，我写完了！

Acknowledgements

Time does fly. Today, I have completed my final year project when first day of school seemed just like yesterday. Since Year One, I have heard of the dreadful FYP, but under the close guidance from Associate Professor Lee Guan Kin, I would say I enjoy the process of writing my thesis. I will miss the times when Prof Lee and I had discussions in her office. Besides Prof Lee, I would like to thank Assistant Professor Yow Cheun Hoe for reading my thesis and giving me valuable suggestions.

Thanks to my parents. Since young, they inculcate the lov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me. As teachers themselves, they are also the very first people in my life who taught m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ext, I want to express my thanks to my girlfriend, who had given me great emotional support through this period of time even though Literature was not her specialisation in university.

Having my thesis completed, marks the end of my university life. Nonetheless, it also marks a new beginning. Here is my utmost thank you to every single professors and lecturers who had taught me in one way or another in my four years in NTU. It has truly been an eye-opener for me, to the academic world and a peek into the real world, preparing me for greater challenges ahead.

Lastly, thank God, it is finished.

目录

	感谢	i
	Acknowledgements	ii
	目录	iii
	摘要	iv
	Abstract	v
第一章	绪论：小说文本、历史书写、现实	1
	第一节 文献评论	1
	第二节 选题意义	3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角度	5
第二章	513：种族暴乱的诠释与再现	8
	第一节 事件的发生	8
	第二节 “官方报告”与“学者看法”	9
	第三节 历史元小说：另一种现实	11
第三章	年代：小说的叙事与建构	13
	第一节 事关 513	13
	第二节 所谓“真相”	14
第四章	预设：读者、作者、评论者	18
	第一节 “读者”的解读	18
	第二节 “作者”与“评论者”的解读	22
第五章	结论：告别的一代	27
第六章	参考书目	30

摘要

本文通过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学者——琳达·哈琴的“历史元小说”理论，解读黎紫书以历史为题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穿透后设小说迂回的语言游戏，把小说中所再现的马来西亚历史，与现实中的历史记载作比较。小说中虚实互涉的叙事手法，渗透着作者质疑客观历史的态度。此外，也透过后殖民的批评视角，看黎紫书如何通过故事情节，影射马来西亚华人模棱两可的身份认同，以及其虚无的社会定位。最后发现，黎紫书想借着《告别的年代》所传达的，是一种辞别历史的态度：让历史成为历史。

关键词：黎紫书、后设小说、历史元小说、历史、马来西亚华人

Abstract

This thesis analyses Li Zishu's first history novel, *Gao Bie de Nian Dai* (The Era of Farewell) based on Linda Hutcheon's theory of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breaking through the sophisticated discourse of a metafiction, to compare the represented Malaysian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records in reality (History). Behind this intertwined storyline of reality and fiction, is the sceptical attitude of the author towards History. Moreover, with a postcolonialism perspective, we observe how Li reflects the ambiguous identity of Malaysian Chinese. With all this, what Li wants to deliver through her novel, is an attitude of "let bygones be bygones" towards history, asking the readers to let go of the past and let history be history itself.

Keywords: Li Zishu, metafiction,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history, Malaysian Chinese

第一章 绪论：小说文本、历史书写、现实

第一节 文献评论

黎紫书在 1995 年首次参加马来西亚中文报，星洲日报第三届“花踪文学奖”便获得短篇小说首奖，接下来的几年，她都频频得奖，因而开始受到国内外文坛瞩目。首次获奖后，黎紫书的作品也受到出版商的亲睐，陆续出版作品集。目前已出版的著作包括微型小说集《微型黎紫书》、¹《无巧不成书》、²《简写》；³短篇小说集《天国之门》、⁴《山瘟》；⁵散文集《因时光无序》，⁶并编著花踪回忆录《花海无涯》。⁷近期新作有 2010 年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⁸以及新旧作品参半的短篇小说集《野菩萨》。⁹

自从黎紫书在“花踪文学奖”一蹴而就以后，这位年轻作家就开始受到评论家和学者的注意，关于她的评论与专著陆续出现。举凡新马、中国和台湾等地都有学者对她进行研究，而研究角度也各有不同。

黎紫书擅长挖掘与揭露暗藏在光鲜外表下人性的黑暗面，她在小说如《蛆魔》、《天国之门》、《推开阁楼之窗》等中的写作手法与气氛营造都给人一种低沉、阴森的感觉，王德威就曾如此评论黎紫书：

以她现有的成绩来看，不论是书写略带史话意味的家族故事，或是白描现世人生的浮光掠影，黎紫书都优以为之。而营造一种浓腻阴森的气氛，用以投射生命无明的角落，尤其是她的拿手好戏。¹⁰

¹ 黎紫书《微型黎紫书》（马来西亚：学而出版社，1999）。

² 黎紫书《无巧不成书》（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6）。

³ 黎紫书《简写》（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9）。

⁴ 黎紫书《天国之门》（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

⁵ 黎紫书《山瘟》（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

⁶ 黎紫书《因时光无序》（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8）。

⁷ 黎紫书《花海无涯》（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4）。

⁸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

⁹ 黎紫书《野菩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

¹⁰ 王德威〈黑暗之心的探索者——试论黎紫书〉，见黎紫书《山瘟》（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页 4。

由此可见，黎说故事的能力是受到肯定的。除了擅长营造阴森恐怖的气氛以外，她在《天国之门》中的暴力书写手法也被拿来和中国作家莫言比较。¹¹此外，正因为她的作品往往对罪以及宗教救赎有深入的探讨和描写，有些学者就从这个角度，对黎的小说与写作手法进行剖析。曾从这一方面分析黎的小说的学者有许文荣、黄一与胡金伦等。

身为女性作家，黎紫书的小说也常常被学者们以性别的角度分析，尝试从小说中人物性别的遭遇与情节解读出一番典型，并结合黎紫书的生平，找出造成这类典型的个中原因。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助理教授林春美就曾在〈在父的国度：黎紫书小说的女性空间〉¹²一文中对黎紫书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叙事结构——父亲的背离”进行详细的论述，把小说中父亲的缺席视为一种更有力的存在。她认为小说中不断出现的“寻父”情节是黎紫书本身的父亲在其童年中的缺席所造成的心理反应。除林春美以外，许维贤也在〈“女人神话”在小说里的演绎——论黎紫书小说集《天国之门》〉¹³一文中对黎的小说情节中所呈现的传统性别意识进行论述与批判，指黎紫书的小说创作一再地搬演“女人神话”，已经成为一种既定的模式。许维贤认为黎紫书如果要成为一流作家，就必须摆脱这样的模式，自成一格。

身为马来西亚华人作家，黎的作品中处处流露出“南洋色彩”，故事写实的同时又有作家的奇思妙想在当中。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是许多学者对黎作品的评价。纵观对黎紫书小说的研究，虽然有许多种角度，但其中最为学者所痴迷，也最多学者探讨的，无非是从后殖民论述的角度解读黎的小说。

身处马来西亚这个后殖民语境里，黎的小说处处渗透着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尤其是《山瘟》与《国北边陲》，当中的马共书写与国家寓言（national allegory）更是为学者所津津乐道。许文荣就曾在其专著《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¹⁴中的其中一章〈第五章：互文性与国家寓言〉中谈到黎紫书小说中马来西亚华族遭遇的隐喻。另外，曾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硕士生的陈晞哲也在其硕

¹¹ 朱崇科〈（一）本土的嬗变：从概念纠缠到意识形态集结于文本呈现〉，见朱崇科《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页97-128。

¹² 林春美〈在父的国度：黎紫书小说的女性空间〉，见《华文文学》，2008年第4期，页75-83。

¹³ 许维贤〈“女人神话”在小说里的演绎——论黎紫书小说集《天国之门》〉，见《华文文学》，2004年第2期，页31-37。

¹⁴ 许文荣《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士古来：南方学院出版社，2004）。

士论文〈论马华作家的后殖民与移民书写——以黎紫书、黄锦树、张贵兴为例〉¹⁵中探讨黎紫书书写历史的策略，并从后殖民的角度，理解她如何通过历史的书写自我定位。

黎紫书的小说固然兴起了文学研究者对马华文学（尤其是黎紫书的作品）与马华历史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然而，类似于这种对黎紫书小说再现历史、重写历史的讨论，似乎也已经到了极致，对于作者身为华人移民后裔如何看待历史、面对现实，却没有更深入的解读，无数的研究后所得出大同小异的结论最终沦为对华人移民历史无力的哀悼。再者，黎紫书之后几年也都不再书写类似题材的小说，转而书写更加贴近人群的微型小说，这样的转型，也是相关研究陷入死胡同的原因之一。如今，黎紫书经过几年“不谈历史”的创作生涯，再次出版了一本《告别的年代》，我也刚好乘上这个“风头”，希望可以从历史与后殖民论述的角度来分析她的这本“大书”。

第二节 选题意义

对于黎紫书小说的研究，从她 1995 年得奖以来就持续不断，不管是对马华文学有多年研究的学者，或是在籍大学生，对这位略带神秘的马华才华型女作家感兴趣的，大有人在。

我对黎紫书的兴趣，是在选修了新马华文文学之后产生的。个人对她的写作风格与气氛的营造十分佩服。如今选择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除了个人兴趣以外，主要是因为《告别的年代》自 2010 年出版以来，还未有专门研究之论著出现。专门研究黎紫书的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金进博士在一个黎紫书专题讲座中提到，长篇小说并不是人人都有能力写的，而且在一位作家或写手的生涯中，第一篇长篇小说扮演着分水岭的角色，常是作者写作生涯前半部分的总结；无论是在内容、写作手法、思想关怀等方面都具有总结性和概括性。黎紫书自己也不讳言这对她来说是一本重要的作品。小说末尾的后记，〈想像中的想像之书〉中，就在谈“为什么要写长篇小说？”这个问题，当中有这么一段话：

¹⁵ 陈晞哲〈论马华作家的后殖民与移民书写——以黎紫书、黄锦树、张贵兴为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8，未出版的学术论文）。

说来这像是我们这一代的小说写手潜意识里为自己设定好的一场马拉松。不啻因为写小说的日子长了累积的创作经验丰富了，身边便会有人提醒你该尝试写长篇，也是因为时候到了但凡严肃的写手总会对自己的写作产生疑虑，便会想到以“写长篇”来测验自己对文学的忠诚，也希望借此检定自己的能力，以确认自己是个成熟的创作者。¹⁶

因此，作为黎紫书写作生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肯定是一部重要的作品，所以值得研究。希望能通过我的毕业论文为这一部小说提供一种解读方式。

根据黎紫书在过往短篇小说作品中对历史的兴趣，¹⁷ 加上《告别的年代》这一部写作生涯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及书中所涉及的“513”的历史符号等迹象，我认为黎紫书这篇小说除了是写作生涯前半部分的总结以外，也是这许多年来书写历史题材作品的总结，通过长篇元小说的长篇幅、复杂叙事、破碎的情节等，表达她对待历史的态度。虽然黄锦树在该书序中写道：“这 513 符号大概也是个假靶，误导刻意求深的读者而已。”¹⁸ 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不管是作者的意图与否，“513”这个符号在小说中必能解读出其作用与含义，因为小说的三层叙事中，第一层叙事的历史背景就是安排在 1969 年“513 事件”的时间点左右，并以此事件作为故事的开始，作为故事第一层叙事主人翁，杜丽安的人生转折点。

目前，尚未有学者针对《告别的年代》进行文本分析。经过一番搜索，除了董启章为黎紫书撰写的附录〈为什么要写长篇小说？——答黎紫书《告别的年代》〉¹⁹ 以外，就只有书评类的文章，或是与作者黎紫书的访谈录音。访谈录音记录的是黎紫书接受中广新闻网〈每日一书〉主持人胡中信的访谈，具体日期不详。²⁰ 至于书评，一是《星洲日报》于2010年在〈活力副刊〉所刊登的书评、一是于2011年5

¹⁶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页 299。

¹⁷ 自 1998 年赴台南访问前马共总书记陈平以后，接下来几年所完成的作品，都以马共历史为题材：《夜行》、《山瘟》、《州府记略》及《七日食遗》。

¹⁸ 黄锦树〈序/艰难的告别〉，见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6。

¹⁹ 董启章〈附录/为什么要写长篇小说？——答黎紫书《告别的年代》〉，见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301。

²⁰ 访谈录音：“000027 论坛 Talking 访问 黎紫书小姐马来西亚女作家 谈小说 1000218 五 Fri.flv”，http://www.youtube.com/watch?v=vZ48BPrNA0s&list=PLECB41E698D3770A4&feature=mh_lolz（浏览：2011 年 10 月 28 日）。

月22日，发表在上海“东方早报网”，名为《告别确凿的年代》的书评，²¹作者小浪对这部长篇小说有独到的见解。小浪认为“黎紫书要以此表达她对记忆和历史的姿态：它们并非如历史书上写的那么确凿无疑；而是像这本（或这好几本）《告别的年代》一样模棱两可，不但作者不明，而且前后断裂，如同无序的时光；甚至前后矛盾，彼此拆解，像两本不同版本的历史教材或父母口中对遥远时代某一特定事件迥异的记忆”。这样的评论把这部新作与黎紫书之前的作品联系起来，延续之前作品的历史主题脉络，启发我利用相应理论深入分析文本的兴趣，望能以学术性的角度分析、论证。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角度

元小说（metafiction，或译后设小说）的写作技巧，虽不是黎紫书第一次采用，她在之前的《把她写进小说里》就已经运用过后设技巧，但学界还无人运用元小说的批评理论为主要论述框架解读黎紫书的小说。

“元小说”这一术语首先出现在美国作家威廉·加斯（William H. Gass）发表于1970年的《生活和生活中的人物》。一般对元小说的解释，都是采用戴维·洛奇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说的：“元小说是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帕特里夏·沃更在《后设小说：自我意识小说的理论与实践》加以阐释：“所谓元小说就是指这样一种小说，它为了对虚构和现实的关系提出疑问，便一贯地把自我意识的注意力集中在作为人造品的自身的位置上。这种小说对小说作业本身加以评判，它不仅审视记叙体小说的基本结构，甚至探索存在于小说外部的虚构世界的条件。”作为众多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与书写技巧的一员，元小说致力于打破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中许多的二元对立，如：真实与虚构、对与错、中心与边缘，甚至把读者与作者的边界也模糊了，有些元小说作品可以让读者参与在故事发展的当中。元小说原来打破陈规的出发点固然值得鼓励，但是发展到后来，许多原小说的创作都走向极端，作家的自我意识过度膨胀，无视读者的存在与需求，以至于把小说变成无止境的文字游戏。这样的现象使人对元小说的解读产生偏颇，加上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刻板印象，形成“后现代主义作品对

²¹ 告别确凿的年代 – 上海书评-东方早报网,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5/22/608198.shtml> (浏览: 2011年6月29日)。

于历史都只有虚无感”，这样的误解，使元小说被贴上“没有人读得懂”的标签。然而，在1988年，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琳达·哈琴就在她的著作《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当中，提出“历史元小说”这样的概念：

所谓“历史元小说”是指那些名闻遐迩，广为人知的小说，既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性，又自相矛盾地宣称与历史事件、人物有关……。对后现代主义的评论一般主要关注的是文学、历史或理论中的叙事。历史元小说融合了上述三个领域，即其在理论层面上自觉意识到了历史与小说都是人类构建之物（历史元小说），这为其重审和改造过去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奠定了基础。

22

琳达·哈琴提出的“历史元小说”理论所针对的是当时欧美的新型小说，她通过元小说复杂的叙事结构，解读出欧美作家对待欧美历史的态度。

在元小说的基础上，历史元小说加入了真实的小说元素，如历史背景、事件与人物等，在原本应该突显其虚构性的元小说中加入了相对真实的成分。当历史，这个被大众普遍接受的客观现实被放置在元小说这样一个完全虚构的装置里的时候，必会产生矛盾与张力，原来公认的“现实”在虚构的小说中似乎并不全然属实，而刻意虚构的情节却好像与事实相符。这样的似是而非，将引发读者思考“真实”与“虚构”的意义，重新界定虚实的疆界。历史元小说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权威叙述“希斯德里”（History）被质疑，作家才会通过元小说这种虚实互涉的表现手法来解构历史，并重新建构“历史”。²³

以元小说的方式书写历史题材，在新马文坛属非常罕见，所以并没有以马来西亚的后殖民语境为基础的相应理论。因此，我认为可以把“历史元小说”的理论挪用到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语境上，对黎紫书的《告别的年代》进行解读，结合后殖民书写的批评视角，审视黎紫书如何通过元小说有别于传统的叙事结构，诠释已成为马华文学传统的后殖民母题。尝试探究这样的历史书写背后又承载了作者怎样的精神状态与对待历史的态度，她冀望建构一个怎么样的“民族寓言”。

²² 琳达·哈琴著，李杨、李锋译《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页6。

²³ 除了虚构与真实的探讨外，《告别的年代》还可以用 His/Her story 的历史叙述理论角度解读，但由于本论文篇幅有限，无法面面俱到，故不多涉足。本论文将着重于利用历史元小说理论中的虚实概念解读《告别的年代》。

以后殖民视角来解读马华作家的作品，已经不是新的角度。自从马来亚独立以来，早期移民的文学创作也是以一种移民以及后殖民的笔调来书写。从早期的“回望祖国”的母题，一直到近二十年来的“文化寻根”以及曾经在马华文坛引起轩然大波的“烧芭论”、“断奶论”等，都生发自马来西亚华人所处的这个复杂的后殖民语境下。

马来西亚（当时的马来亚）于 1957 年正式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建国，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以后，表面上的殖民统治似乎已经结束，但事实上，殖民统治或思想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在独立后的马来西亚国土上延续。外来侵略者撤退后，取而代之的是表面合法化的“文化殖民”。马来民族霸权主义名正言顺地接收这块土地，压制其他种族的文化，只承认马来文化为国家文化、马来文学为国家文学，无视马华与马印文学文化的存在。在这样的政治与权力压力下，马华作家惟有通过自己的笔锋，透过文学作品，书写自己的民族寓言，抒发自己压抑的民族情怀与不满，建构自己理想中的“故国”。这样的典型有温氏兄弟——温瑞安和温任平，以及他们所开创的天狼星诗社社员。许文荣也援引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其著作《政治无意识》中的观点：“一切文学，不管多么虚弱，都必渗透着我们所谓的政治无意识，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²⁴ 来作为他论著《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的出发点，为马华文学进行后殖民的解读。

许文荣博士在其论著中也有评论黎紫书的小说，并对当中涉及的历史书写题材进行梳理。但是，由于小说内容的限制，其分析也只能停留在故事情节的表面，难以从现实小说的结构与写实的情节下手，最深入也只能从她阴森诡异与暴力的书写分析。因此，这部以后设手法书写的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提供了另一个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就是黎紫书如何以元小说的后设手法，在马来西亚的后殖民政治与语境中，以虚实互涉的方式重新“温习”历史这个旧题，书写“513”这个符号的故事，而结果是否会像书名所说，“告别”了什么？如何“告别”？相对的，是否又“迎向”了一个怎么样的未来？

²⁴ 詹姆逊著，王逢振、张永国译《政治无意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页 8。

第二章 513: 种族暴乱的诠释与再现

第一节 事件的发生

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共同居住的国家，马来西亚的族群问题其实早在独立以前就开始酝酿，而导因就是英国殖民地政府采取的种族主义和分而治之的政策。英国当局制定种种法律和政策以隔离各个民族并扶持马来统治者作为有名无实的领袖，²⁵同时，限制华人与印度人不能参与行政及政治工作。多年下来，如是政策保存了传统马来封建社会的政治和意识结构。直至马来亚独立，表面上是以建立多元种族国家与社会为前提，但实际上，从殖民地时期延续下来的矛盾，在各种族人民之间已经根深蒂固。

随着国家独立，除了马来人，华人与印度人也开始争取自己身为马来亚人民的权力，不论在人民权益、国籍身份、经济与政治势力等方面都希望能与占人口大多数的马来族平等。对马来西亚华人来说，在教育方面的努力尤其显著。华人既然已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就想尽办法让中华民族悠久且独特的传统与文化遗产下去，因此，在争取华文教育（华教）方面，不遗余力。正因为致力于华教，华人社会与马来民族为主的政府明显产生了矛盾，使种族之间的矛盾浮出台面。

60年代的马来西亚并没有以华文为媒介语的最高学府，国内惟一的一所大学，马来亚大学又不接受高中文凭，许多华文独立中学²⁶（独中）的毕业生于是只好在毕业后出国深造。教育部于1967年宣布，从1968年开始，只有拥有剑桥文凭或马来西亚教育文凭的学生才能出国深造，切断了华文独中毕业生出国深造的管道。为了解决独中毕业生的升学问题，1967年12月8日，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常年代表大会上通过将联合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领导设立一所华文大学，“独立大学”。在创办期间，“独大”屡次被政府阻拦，甚至在执政党联盟中代表

²⁵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编著《马来西亚种族两极化之根源》（吉隆坡：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87），页6。

²⁶ 华文独立中学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独立开办的中学，以华文、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遍布全马来西亚全国各地，成功在华人占少数人口的马来西亚延续华文教育。

华族声音的政党马来西亚华人公会²⁷也不予支持，称独立大学的开办为“铁树开花”。申办独大适逢大选期间，反对党于是借题发挥，利用独大这个课题来攻击政府与马华，在大选时期争取选票。1969年5月10日的大选中，反对党大胜。在获得了突破性的成绩后，反对党在首都游行庆祝，巫统内部强硬派大为不满，在吉隆坡市区发动反示威。就在5月13日，两派人马起冲突，酿成了历史上的513种族流血暴动。

暴乱于5月13日发生之后，紧急状态于16日实施，由敦拉萨领导的“国家行动理事会”随之成立，整个国家都在行动理事会的管治之下，宪法被中止。

第二节 “官方报告”与“学者看法”

根据书籍记载，官方正式发布的报告中表示，骚乱起因是：马来人觉得他们在经济上落后，华人控制了经济，使马来人没有机会。²⁸再加上反对党在大选成绩公布后，因取得可观成绩而向执政党和马来人挑衅，引发种族暴乱。因此，根据官方说法，煽动1969年大选后的种族暴乱的责任，应由反对党来承担。²⁹“513事件”之后，为了解决经济上不平等的问题，政府于1971年推行了“新经济政策”的经济改革计划，该计划的两大目标是：（一）重组社会，以纠正由于财富拥有权的不平衡，而产生以经济活动辨识种族的现象；（二）消除贫穷。新经济政策对日后马来西亚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并族群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来西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在所出版的《马来西亚种族两极化之根源》中对“新经济政策”有如是评论：

第二项目标在理论上是有裨益的，不过政府倾向于将“贫穷”及“马来人的贫穷”视为同等。尽管如此，政府解决乡村贫穷的前提和方法也是令

²⁷ 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马华公会）是组成当时执政党联盟（现国民阵线，国阵）的三个政党之一，另外两个政党为代表马来民族的巫统以及代表印度族群的马来亚印度国大党。

²⁸ 刘务求编译〈大马华人政治状况：五一三事件的影响〉，见《90年代大马政治》（古晋：Impact Management, 1997），页93-95。

²⁹ 柯嘉逊著，杨培根译《513解密文件：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吉隆坡：Polar Vista有限公司，2007），页1。

人质疑的。换言之，一开始，第一项目标的基本前提是不正确的，它只能产生分裂及种族主义的不良影响，这种情况确实已经发生。³⁰

由此可见，学者对政府实施的，自称是重组经济与社会的新经济政策是带质疑态度的。它并没有解决种族之间的问题，而是更加分化马来西亚的不同种族。

由政府委任的“国家行动理事会”虽然在暴乱之后出版了一份相关报告书，³¹ 理应把暴乱的来龙去脉整理清楚，给人民一个交待，然而，513事件的这一套官方说法，并不被大众所普遍接受，尤其是马来西亚华人。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柯嘉逊博士对513种族暴乱的相关文件进行多年考证与研究，于2007年与出版了中文版的《513解密文件：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杨培根翻译。柯博士结合当时伦敦国家档案馆初解密的文件分析513事件，尝试还原历史，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段由官方权力话语叙述的“官方历史”。对于官方说法，译者在该书前言中提到：

我民众至今都不明了，引起大马历史上这场最糟糕的种族暴乱的真正前因后果。官方说法充满了互相矛盾的说词，并且有纰漏和不足之处，因此，难以令人相信。³²

除此以外，1969年的种族暴乱，对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与文化的国家来说，是一段黑暗的历史，统治者不鼓励人们讨论它。可是，每当马来西亚大选来临，国家现状受到威胁时，如：1990年大选，或者，每当非马来族群提出维护民权课题的时候，马来西亚执政党就会召唤出这个“513幽灵”来。以半恫吓的方式警告大马人民不准质疑其国家现状，“不然……513事件可能会再发生！”

身为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柯嘉逊博士对513事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发生在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暴乱决不是多元族群社会中自发的种族暴乱。³³ 根据他所搜集到的解密文件，发动这场种族暴乱是有计划的行动，这是新型马来官僚资产

³⁰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编著《马来西亚种族两极化之根源》，页42。

³¹ 全国（马来西亚）行动理事会《全国行动理事会报告书：五一三悲剧》（吉隆坡：全国行动理事会，1969）。

³² 柯嘉逊著，杨培根译《513解密文件：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页2。

³³ 同上。

阶级推翻落后的马来贵族的政变。³⁴ 以种族暴乱确保其崛起后，通过“新经济政策”巩固其政治势力。

从以上两个观点看来，513事件的发生，并非自然源于马来西亚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与分歧，而是有心人士在背后有计划地煽动与操纵种族情绪，种族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种族化，马来西亚华人只是这场政治斗争中的替死鬼，马来统治者借这个机会，实施“新经济政策”，合法地打压华人，使华人的经济势力与发展于1971年之后大受限制。

综上所述，513事件之后，马来西亚华人的经济与文化都被打压，政府以“重组社会，消除贫穷”为名，限制华人经济能力与文化势力，使马来西亚华人在社会地位上居于劣势。马来西亚华人于是就在一种被压迫的环境中茁壮、繁衍。而经历过这一段“黑暗的历史”的先辈也以这种抵抗的精神教育513事件之后的一代又一代。

后513出生的黎紫书³⁵属于在抵抗精神教育下成长的年轻一代，并没有亲身经历513。正如第一章所述，黎紫书虽然没有经历抗日、马共等历史阶段，却在书写相关题材的国家/族群寓言上非常成功，因此，她如何在《告别的年代》中再现与诠释513事件，成为了读者与学者的焦点。

第三节 历史元小说：另一种现实

黎紫书一向热衷于书写与历史相关的题材，尤其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她之前所创作的中篇小说《山瘟》、《国北边陲》、《七日拾遗》等都涉及历史题材。然而，黎紫书对历史却抱持一种不信任，甚至轻蔑的态度，在书写历史的时候，她以带有浓厚的民族寓言色彩的笔触，通过虚构的故事情节来重构真实的历史。黎紫书这样把一向被当作客观现实的历史记载问题化的精神，就是历史书写元小说的精神与目的。然而，之前的作品都只局限于建构作者想象中的现实，通过写实的说故事手法，去重构历史。《告》则是采用元小说的形式，突破了以往的叙事框架，因

³⁴ 柯嘉逊著，杨培根译《513解密文件：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页2。

³⁵ 黎紫书于1971年生于马来西亚霹靂州的怡保。

此在探讨“历史”这个概念上的立意更深。《告》多层叙事的元小说结构、虚实互涉的写作手法，不只打破人们对历史与历史事件的既定印象，质疑历史，更加在相同的文本中重新确立该段历史或历史事件所处的语境。表面上，这是自相矛盾的，但自相矛盾就是后现代主义的精神。琳达·哈琴对历史元小说自相矛盾的特征有这样的阐释：

历史元小说一清二楚地保持了其形式上的自我再现和历史语境，而在这一过程中，却把历史知识的可能性问题化，因为在这一点上没有妥协和辩证法——只有悬而未决的矛盾。³⁶

此外，她也提到，在后现代小说和历史里重写和表现过去均等于将过去向现在开放，避免使过去显得已经尘埃落定且带有明确目的性。³⁷黎紫书写作生涯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后现代元小说的形式出现，又以历史事件为题材，便是这个目的。通过元小说的方式，那深藏在人们心中的“黑暗的历史”，被元小说强烈的自我意识的特征重新“照亮”，以 513 事件为导火线，反思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审视这个族群的命运。

黎紫书以元小说如此充斥着自我意识的形式来书写历史题材，虽然理论上重在反思，内容固然也有回顾与反思，然而在这以外，《告》还有另一层意义。顾名思义，实际上，反思之后，黎紫书真正希望的是告别，告别这个她自称“不属于我的年代”。³⁸在接受中广新闻网〈每日一书〉主持人胡中信的访谈时，黎紫书表示，马来西亚的华裔年轻人在写作的时候，时常会投文学奖评审所好，刻意书写一些与当年的马共、抗日战争等有关的历史题材，因为这些题材的作品常常得奖，但她希望看到的不是这些作品，她更希望年轻人去发掘身边可以进行创作的题材，希望文学作品与日常生活更贴近。因此，我相信黎紫书创作《告》就是希望为这样的一个风潮划上句点，让文学更多元化，不要继续一味地为华人的命运自怨自艾。本文将小说不同的叙事层分章节，探讨黎紫书如何以元小说这样特殊的文本形式阐述历史，最后告别历史。

³⁶ 琳达·哈琴著，李杨、李锋译《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页 142。

³⁷ 同上，页 147。

³⁸ 黎紫书〈后记/想象中的想象之书〉，见《告别的年代》，页 300。

第三章 年代：小说的叙事与建构

第一节 事关 513

《告别的年代》分为三个叙事层，讲述三个表面上不同，但又似乎连贯，甚至重叠的故事。第一层叙事中的时间正是始于 513 事件发生的那一年，以 60-70 年代的马来亚为时代背景，叙述一个少女杜丽安一生的故事；第二层叙事的时间段是第一层叙事之后的好几年后，叙述主角“你”的生活故事；第三层叙事则是“第四人”对书中《告别的年代》的评论以及关于“作者”韶子的奇闻轶事。本章将先着重讨论第一层叙事，第二与第三层叙事的分析见本论文的第四章。

第一层叙事的写作手法基本与传统写实主义小说无异，惟独不同的是，故事中也出现了一本《告别的年代》。而且，在小说的第一章之前，还未开始叙述杜丽安的故事，就有一段开篇文字，叙述“你”如何开始阅读《告别的年代》，³⁹ 尝试定位它：

你认得出来这种问题和读感，那语言有股旧时代的陈腐味，蘸饱了南洋的蕉风椰雨和侨民们的风流韵事。……你一直以为这是一种正在消失中的历史语言，一种适合为祖父辈状写传记的文字。所以在初看这段似是而非的“引言”时，自然而然地把这书划为“史册/传记”类……。⁴⁰

有别于一般写实小说，黎紫书以第二人称“你”作为小说人物的指涉，而“你”和读者一样，是一个正在阅读一本名叫《告》的书的读者。这样的写作手法，是典型的后设小说技巧，通过第二人称“你”的运用，作者打破读者与小说文本之间的隔阂，把读者写进故事当中，模糊现实和虚构的疆界。故事中的《告》与读者手中的《告》既相同，也相异，使读者不知如何判断叙事中对《告》的评价是否真实，是否也是对黎紫书这本《告》的形容。虽然小说中的《告》没有扉页、版权页、书名页，“既没有标明出版者，也找不到作者的姓名”，显然与黎紫书的《告》不同，但当它被“你”找到时，和黎紫书的《告》相同，也是从 513 页开始。从 513

³⁹ 以下简称《告》。

⁴⁰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14。

页开始的，应该是残缺了之前的五百一十二页，但它却“外表看来完整无缺”，且“无法印证那五百一十二页的存在”。黎紫书就以这样的似是而非，冒充读者，对《告》进行界定、定位，试图建立文本中的真实，而这文本中的真实（事实上是虚构）就因相同的“能指”——《告》这个书名而与读者所认知的现实产生互动，“你”对小说中的《告》越进一步地描述、定位，虚构和真实的界线就越模糊，以致虚实难辨。

黎紫书利用开篇的一段文字对小说中的《告》进行一番分析与解读，除了玩弄真实与虚构的定义，实际上也是为她这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导读。当中对《告》的描述，字字句句都说明当中的内容与历史的关系，然而，放置《告》的“那书架紧挨着‘历史/传记’类书籍的专柜，上面标明的类别是‘其他’”，小说中又说到，在“几乎每一本书都可以找到它们适当的位置”的图书馆里，“被归类为‘其他’意味着被放逐”，因为“书的内容模棱两可，定位含糊不清，才一致同意让它们流落到这五层高的铁质书架上”等等，这种种的描述，熟知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人或马来西亚华人都知道，文本中的《告》这本书暗喻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命运与在马来西亚的身份，因此黎紫书的《告》是在写与历史有关的故事，而且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故事。

第二节 所谓“真相”

无法归类、从 513 页开始的，以及“无法印证的那五百一十二页”，种种细节都暗喻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命运。513 事件后，政府打着“重组经济”的旗号，于 1971 年实施新经济政策，限制非马来族在经济上的发展，给予马来人，也就是“土著”各方面的特权。因此，非马来民族，如华人与印度人就开始被边缘化。马来西亚华人的命运从此改变，马来文被制定为惟一的官方语文，而且只有马来文学受承认为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学，使华人移民后裔无所适从。在这个自己打算“落地生根”的土地、国家，自己的语言、文化和文学却不被承认，要如何继续在这一块自己期望落户的国度发展自己的文化？华人又要如何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是华人，还是马来西亚人？抑或是中国人？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与身份就是处在这样“模棱两可”的状况，“定位含糊不清”，最后落得被“放逐”，在正当归类的、官方的

“历史/传记”类别以外，成为“其他”。513事件之前，从中国南来的华人先贤在南洋所做出的一切贡献也都被抹杀了，就好象《告》那似乎残缺，但却“无法印证的那五百一十二页”。

全本小说中对513事件有正面描写的篇幅虽然不算多，但却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真实”的部分，是历史元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与现实连接的历史背景，小说的第一章就通过“你”对马来西亚历史的认识，记载了一些历史事实，简单地交待513事件的前因后果：

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你虽然年轻，却也略懂513这数字可能蕴含的含义与暗示。那年国家大选，一向执政的国阵联盟失去了三分之二议席的优势。五月十三日那天反对党在都城游行庆祝，没想到引起暴乱、失火和流血。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在全国实施戒严四天。⁴¹

叙述了众所周知的史实之后，叙述者紧接着描述“你”对513这个符号的印象与认识：

你记得513曾经是一组紧急的数字。即使在事件过去好些年后，人们再提起这串数字时，仍然习惯压低嗓门，用一种闷在咽喉，或顶多到达鼻子的声音，把它“说”出来。人们神秘兮兮的眼神和闪缩其词的表现一直令你不安，以致你每次打开这书，看见第一页右下方的页码时，都感到触目惊心，觉得那五百一十二张缺页暗示着空白与忌讳，有一种挑衅，质问，或不可告人的意思。⁴²

通过这两段的叙述，作者建构了一个文本中“真实”的部分，与现实的历史事件，513种族暴乱是相同的，借此将文本与现实生活和历史连接起来，建立反思历史的基础。叙述者以说故事的方式，简洁明了地再现了史实与民间对这一段历史的态度。然而，当小说主人翁杜丽安出现后，文本中的“真实”却又不尽然与现实或“你”想象中的“513”相同。

⁴¹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17-18。

⁴² 同上，页18。

小说文本中的时代背景就是 1969 年 513 事件期间，60 年代末、70 年代的马来亚。女主人翁杜丽安与母亲和弟弟在锡埠这个小镇开炒粉档，经历了 513 事件。小说的第一章叙述了许多“五·一三那天”所发生的事，但没有一件是直接和种族冲突相关的。事发当天，杜丽安还在看小说；她的母亲一如既往地开档；弟弟和平时一样兴高采烈地和朋友去打羽毛球。杜丽安以及锡埠的老百姓都没有意识到 5 月 13 日那天发生了天大的事。他们并未意识到那日子有多么不寻常，⁴³ 小镇里的男人都沉浸在大选结果，以及一个当地州议员候选人的死当中，将国家大事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

在同一章里，黎紫书先根据历史记载，简述了 513 事件，之后再以叙述者的身份“冒充”读者“你”，再现大众看待 513 这个符号的心理与态度，紧接着，小说叙述主人翁杜丽安对 513 的记忆与经历。这样的形式，使三种不同角度，对于同一段历史的叙述一字排开，让读者可以进行比较。这样的叙述手法目的在于把历史问题化，质疑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在叙述了现实中 513 事件的历史记载，以及这符号在人民心中的含义后，黎紫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 513，也就是杜丽安的角度。1969 年 5 月 13 日发生的种族暴乱虽然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是个重要事件，对其后马来西亚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但根据小说中的故事情节，513 事件以及都城发生的，种族之间的冲突，对杜丽安的家庭的生活并没有多大影响。1969 年 5 月 13 日对他们以及锡埠小镇上的居民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活在 513 当下的人，并没有被影响，惟有当杜丽安“不断回想”的时候才发现异样：

后来杜丽安不断回想那一天，才觉得当时的情景欢乐得像随时要蹦出一个卓别林式的彼·南利来。那画面充满电影感，其实有一种不祥的味道。

44

由此可见，并不是全马来亚所有的人都被 1969 年 5 月 13 日的种族暴乱所影响，冲突事件多数发生在都城，很多人，好像杜丽安，是事后“不断回想”的时候才察觉当时的“不祥”。不管是否经历过 513，人人都开始对此事件进行渲染。结

⁴³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22。

⁴⁴ 同上。

果，日子久了，造成没有经历过 513 的“你”，“在事件过去好些年后”，从“人们”的一举一动中认识“513”这个符号为“禁忌的数字”，“人们神秘兮兮的眼神和闪缩其词的表现一直令你不安”，好像“你”真的亲身经历过 513 事件似的。与杜丽安相比，没有经历过 513 的“你”，被他人所影响；活在那个时代的杜丽安反而觉得 513 没什么。更加讽刺的是，杜丽安在五·一三当天的确经历了一些改变她命运的事，但却完全与种族暴乱无关，只是因为当天刚好一个疯子突然发狂闹事，袭击杜丽安，让锡埠的一个黑社会老大钢波有机会救出杜丽安，尔后，钢波就对杜丽安展开追求，杜丽安就嫁给了钢波。因此，这三个不同角度叙述的历史突显了历史以及“事实”内在的问题，小说在质疑所谓的“众所周知”以及客观的历史。

从“你”对“513 事件”的认识，小说尝试说明历史可以被建构，历史事件可以被符号化，并可被赋予超越客观现实所发生的事件本身的含义。被人们当作事实接受的“历史”其实并不那么可靠，所谓的“真相”其实有很多种，就如琳达·哈琴所说的，小说和历史都是叙事，只是框架不同而已，就是历史元小说先建立，后来又跨越出去的那种框架，它以此设立了小说和历史的体裁和约。⁴⁵ 黎紫书就是希望借着小说的叙事，来挑战历史，质疑历史的指涉性，道出官方史料和其他传统历史记载之外的“真相”，为小说反思历史的主题思想立下基础。

“513”这个符号虽然出现在完整书名中，也在封面构图上出现，但全篇文本中对其描写与探讨篇幅不多，惟有在小说的第一章中比重较大，因此我认为“513”只是引导作用，确立小说的历史主题，并连接文本与现实。《告》真正的重点在第二和第三层叙事。第二层叙事再现思想与主题，第三层叙事则体现元小说的自我意识精神，对之前文本中所建构的“真实”进行解构，以达到反思历史的目的。

⁴⁵ 琳达·哈琴著，李杨、李锋译《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页 147。

第四章 预设：读者、作者、评论者

第一节 “读者”的解读

根据历史元小说的理论，以元小说的方式来编写历史题材，是在挑战历史与现实的思想主题。黎紫书运用后设小说的写作手法，把读者，“你”和文本，《告》都写进她的长篇小说里，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小说文本的“真实性”，让读者认为文本中的叙述都属实，从中利用象征、暗喻和隐喻等手法，诉说马来西亚华人的处境和命运。在黎紫书过往的作品中，对马来西亚华人命运的书写最为深入的非《国北边陲》莫属。

《告》的第二层叙事讲述的是“你”的故事，由一个全知的叙述者叙述。

“你”住在一个叫“五月花”的旅馆，母亲是个妓女，两母子被五月花的老板细叔收留。“你”就是《告》的读者，为了寻找自己的父亲而到图书馆去，并在那里发现了《告》，希望从中可以追溯自己的身世。“你”最终认定《告》就是“父亲”的遗物：

现在你把它当成了“父亲”的遗物，那是他故意留在图书馆里，等待你去认领的东西。书里面藏着某些等待你去指认的秘密，而且你已经喜欢上书里的韶子了。⁴⁶

这里的父亲用了开关引号，可见它另有所指，“父亲”可能已不存在，或根本不存在，它已经成为了某种象征。黎紫书以她擅长营造的黑暗、阴森的小说氛围书写第二层叙事，字里行间渗透着疑惑与抑郁的情绪。

“你”除了寻找父亲以外，从小就常常处在寻找的状态中。小时候，母亲就常常把玩具藏起来让“你”去寻找，这样“你”就不会来烦她，有时候母亲所说的玩具并不存在。⁴⁷“你”最后甚至怀疑母亲把父亲藏起来了：

⁴⁶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115。

⁴⁷ 同上，页 25。

那味道还在。一种调侃的意思。“找到你的父亲吗？”仿佛她把父亲藏起来了，而这不过是她在张腿分娩时设计好的一场恶作剧。你生下来就注定要参与这场游戏。⁴⁸

“父亲”象征源头、起源，因此，“你”在寻找父亲，就喻表“寻根”。而且，根据以上所引段落，“你”之所以要寻找父亲，似乎是打从出生时就注定的，是“你”的命运、宿命。“寻找”的母题，在黎紫书的小说中不是第一次出现。她的中篇小说《国北边陲》叙述的也是一段关于“寻找”的故事，但《国》的主人翁不是在寻找父亲，他寻找的是能够帮助自己生存下去的解药或方法。《国》的故事被解读为一个影射马来西亚华人命运的民族寓言。有了黎紫书之前创作手法的先例，《告》中对父亲的执著与寻找，可以解读为马来西亚华人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与定位时，对“故国”，中国以及“中国性”的寻觅与执著。

上溯中国移民到南洋的移民史，因着战乱与生活，辗转来到南洋的华人先辈，华人在此成为占少数的种族。在这里落地生根后，与在地土著的矛盾与冲突让第一代华人移民的子子孙孙不禁对那已逝去的“故乡”产生各种想象，在不被本地文化与人群接受的时候，转而利用各种方法奋力抵抗其他文化，努力坚持自身的中华文化，并尝试寻回自己身份认同的归属。然而，就好像“你”寻找父亲的过程与结果一样，只能通过阅读《告》来对自己的父亲与身世进行无穷尽的想象：想象母亲是第一层叙事中的杜丽安，父亲则是她的情人，一个重叠的身份和角色，无法确定是孪生兄弟中的哪一个。“你”的身世就是如此的模糊不清，就如马来西亚华人，当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尤其华文教育被限制与打压时，无法认同本土文化的时候，却业已无法寻回对中国的认同，只能无止境地寻找与想象，那只存在心中的“故国”。象征根源的“父亲”一词成了禁忌；“作家”，肩负发扬文化的重任，也变成了一个别扭的辞藻，甚至感觉这像一种根本不存在的职业。⁴⁹为了充分表现马来西亚华人的无助与迷茫，就连叙述手法也是似是而非、似有还无的状态。

小说里，“父亲”是“你”主要寻找的目标，但其过程中“你”也对另外两个人物特别感兴趣，J和玛纳，J貌似“你”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玛纳则是一个住在五月花旅馆的神秘泰国女孩。

⁴⁸ 同上。

⁴⁹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28。

J在第二章出现，“你”认为他是你失散的孪生兄弟。虽然面貌相像，但他却有优越的出身，与“你”不同。他就读于很好的学校，家境富裕。“你”看到他的时候就好像看到自己。就好像马来西亚华人心目中希望自己可以有好日子过，能够像其他地区的海外华人一般有好的待遇和环境，“你”认为J是自己的孪生兄弟，可是他们之间却隔着可望不可及的距离。⁵⁰“你”的母亲却自相矛盾，曾说你有孪生兄弟，之后却似乎因为记忆力衰退而记不起J，也不知道是否是她在戏弄“你”，重复那寻找的游戏。因此，J是否是“你”的孪生兄弟？文本中没有真相，只有无限的可能，读者只能猜测、想象。“你”的思绪，以及对于J，也都充满了想象。当“你”在快餐店的同事黑杰克误以为J是“你”之后，有这样的描述：

你愣了一下，忽然觉得不好笑了。你马上意识到黑杰克遇见的人并不是你。那一定是J吧？他果真与你在同一天出生。你和他住在同一座城里，一人在前台，明亮的聚光灯下；另一人在后台，城市长满黧癍的阴影中。你和他都搂住自己心爱的女孩，庆祝你们共同的生日。你不喜欢这想像，他揉进了让人不悦的现实；你又想起小时候总困扰着你的某个想像——那与现世错开的镜中世界。你凝视镜中男孩身后的背景，并幻想镜上有个隐藏的按钮或门把，也很可能得靠某句暗语，镜里的孩子就会开门让你入内。那里会有你从未得到却已然失去的一切。⁵¹

这样的不确定与模棱两可，暗喻了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J就好象源自同一个“母亲”，在同一个“故国”出生，之后却到了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命运。J的生活虽然是“你”遥不可及的，但他的存在，似乎成为“你”的一种安慰，⁵²同时又是对“你”的折磨，因为他在“镜像世界”中拥有了“你”所没有的，“你”和J是如此相像，而“你”却无法拥有自己想要的。其中，“从未得到却已然失去的一切”，看似矛盾，但其实就是马来西亚华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吊诡，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⁵¹³之后，无论是在文化、国家或民族层面上，马来西亚华人都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处境里。1971年，政府推行“国家文化政策”，独尊马来文化与文学，分别推选为国家文化与国家文学，并把马来语列为官方语言。在这样的环境下，马来西亚华人在文化与教育上，就受到了影响、压迫。当华人无法被马来

⁵⁰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40。

⁵¹ 同上，页200。

⁵² “J尚在。你于焉满足。”，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41。

西亚的国家体制所认同时，在身份认同方面就失去了对象和方向，于是希望以中华文化寻求身份认同，但往往也陷入迷失。

小说的第三章，“你”的母亲死后不久，从住在五月花的妓女们口中听说有一个很年轻的泰国女孩，名叫玛纳。叙述中，她非常的神秘，在母亲还没死之前就入住五月花，但“你”却不知道，于是决定利用会考后等待放榜的长假把她找出来。玛纳住在“你”的楼下，204号房，在与她面对面，认识她之前，“你”就已经潜入她的房间，送她指甲剪、非洲菊，还帮她把鞋子上脱落的装饰品补上，甚至对她产生性幻想，在梦中射精。终于，玛纳在看到了“你”送的花和所修补的鞋子后，趁“你”不注意的时候进入房间，留下了一张照片：

她进来了，走了，留下一张照片。很可能在你洗澡的时候。你凝视照片里的人，忽然被某种不曾有过的情绪触动。那是一种美好而哀伤的感觉，它在你的心脏与肺腑之间，像一簇不断膨胀中的气球，让你以为自己被充满。你觉得自己被寻获了。就是这样一种虚无的幸福感吗？让母亲自愿死在那一刻。她闭上眼睛里的眼睛。我在人世已然饱足。⁵³

当一直在寻找事物和人的“你”发现玛纳知道她的存在时，竟然有“自己被寻获”的感觉，从一个寻找者的身份，变成被寻找的。然而，被寻获后却又有一种吊诡的“虚无的幸福感”。这样的感觉，似乎和“你”的母亲死的时候所感受到的“饱足”相同，在那时刻，原本希望找到父亲的“你”，似乎也因为玛纳的出现而满足了。虽然玛纳是哑巴，但这并不阻止“你”和她相爱。小说中描述了许多他们互相爱抚，甚至口交的场景，但他们始终没有发生性行为。

找到玛纳后，“你”似乎过着幸福的生活，虽然偶尔会想起母亲与一些悲伤的往事，但仍比过去执著于寻找父亲来得快乐。但在“你”生日那天，同事黑杰克放工后载着“你”去兜风，却在一个人妖和妓女聚集的地方看到了玛纳。这与玛纳在“你”心中的形象完全不同。“你”原以为她是清丽脱俗的一个年轻女孩，没想到竟然是妓女，甚至可能是人妖。玛纳当晚也看到了“你”，之后，她便离开了五

⁵³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118。

月花，在“你”的笔记本里留下了圣经里耶稣说的一句话：“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⁵⁴

玛纳和“你”从最初的神秘，经历了相知、相见、相爱，最后道别，小说的第二层叙述从第四章开始就把焦点放在玛纳这个人物身上。“你”在认识玛纳之后，似乎满足了，圆满了，不需要再寻找父亲。如之前所述，若“你”的经历影射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命运，那玛纳就好比华人的另一种身份认同，好像J一样。当“你”找到玛纳时，父亲似乎不再重要，“你”每天所期待的就是玛纳，她是“你”自己真正拥有的东西。然而，最后她却与你的想象大相径庭，原本崇高美好的形象在一夜间毁了，玛纳竟然是人妖，这是小说中的另一个吊诡。玛纳离开时留下了根据《圣经》记载，耶稣所说过的一句话，而“你”则以像孩童似的，一张祈祷者的脸⁵⁵向细叔询问玛纳的下落，暗喻着“你”原以为玛纳就如耶稣、如救主一般，从黑暗中拯救了“你”，生活变得有目标、有希望。然而，到最后却成为一场空，影射马来西亚华人注定无法找到自己所渴望的身份与定位。

J和玛纳都是“你”向往和寻找的对象，J是“你”永远达不到的彼岸，而玛纳是个错觉、错误的对象。就如马来西亚华人的处境，在身份认同与定位中迷失。

第二节 “作者”与“评论者”的解读

后设小说的结构比传统写实小说复杂。黎紫书以完全不同于一般小说的方式来呈现《告》的第三层叙事。第三层叙事主要转述对于文本中小说《告》的文学评论。黎紫书还在故事中加入学术论文中常用的注脚，但当中的内容都是虚构的。因此，普遍上被认定为真实的注脚在小说中也被质疑，成为虚构，使读者在虚实之间更加迷失。

小说的第二层叙事一开始便把预设读者，“你”写进小说里，接着在第三层叙事中，黎紫书更进一步把作者也写进小说里。第三层叙事中，出现了对文本中《告》的作者，韶子的叙述，以及在作品、作者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之外，评论《告》

⁵⁴ 同上，页 235（引自《圣经》约翰福音 15 章 12 节）。

⁵⁵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237。

的“第四人”。小说第三层叙事的叙述都是来自于“你”对《告》的背景的研究。韶子一方面是一位作家，但同时也是个在夜市场卖内衣裤的社会底层人士，坊间称她“丽姐”，但这个身份在她生前不为大众所知。“第四人”则是一个专门研究与评论韶子的作品的文学评论家，他的评论与韶子的作品可说是如影随形。小说中提到，“藏书家们无不明白韶子的著作必须与第四人的评论配套，才能算是‘完整’的收藏。”⁵⁶ 第四人依赖韶子到了极致，甚至被怀疑在韶子死后模仿韶子的写作手法来创作《告》。这一切的叙述，其实是在转述预设读者“你”在阅读文本中的小说《告》所得到的讯息。当中对第一和第二层叙事的一些内容都有加以分析，并结合韶子其他的作品来解读《告》的情节。

在第一层叙事和第二层叙事的基础上，黎紫书加入了第三层叙事，内容与第一和第二层叙事相互呼应，让读者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三个故事在某些情节上似乎有连贯性，但往往在下一个情节又被推翻、前后逻辑不通了，尝试把这三段故事联系在一起，或是想根据小说中提及的历史事件追寻它故事的踪迹的话，就会如小说中的预设读者“你”一样，因为尝试从《告》追溯自己的身世，而在看到杜丽安和叶望生幽会的情节时，“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与他们交叠在一个空间的两个时间层上”。⁵⁷ “你”想象杜丽安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自己和J是孪生兄弟。不管是读者或“你”所设想的，虽然都有可能，却都无法印证，也不能自圆其说。

黎紫书在第三层叙事的第一章就以后设笔法刻意曝露小说的虚构性，首先告诉读者，文本中的预设小说读者“你”发现在小说的后半部出现另一个杜丽安，是小说的作者，看到这里，“你”描述“那感觉像是沿着迂回的走廊打开一道一道外观各异的门，而最终竟通向原处，或至少是一个与‘原处’极其相似的地方。”⁵⁸ 而在小说的后半部，杜丽安有个笔名，叫“韶子”。关于这段描述，以及“原处”，我认为就是对“真相”的比喻。

刻意曝露小说的创作性与虚构性，是后设小说的特征，以元小说书写历史题材之后，原本虚构的小说混入了真实，原本真实的事件，却叙述得像虚构事件，⁵⁹

⁵⁶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61。

⁵⁷ 同上，页 163。

⁵⁸ 同上，页 31。

⁵⁹ 文本中的第四人评论韶子“把真实写得像道听途说。他甚至质疑韶子对待历史的态度，……”（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33）。这虽然是对文本中的《告》的评论，但小说中对 513 事件、首

让人虚实难辨，就如文本中的“你”在读小说所产生的感觉，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否回到原处，还是只是到了一个与“原处”极其相似的地方。甚至最后连“原处”是什么样的，在哪里，都已经忘记。如此情节即暗喻了小说中的三层不同叙事虚实互涉的主线：第一层是在对于 513 事件的了解上；第二层对于父亲的身世；第三层则是第四人的评论取代了韶子作者本身。这三层叙事的共同点就是，叙事中的真相都被虚构的话语所掩盖。

对于小说第三层叙事中虚构的评论与虚构的韶子的作品，黎紫书通过预设读者“你”的读后感，尝试把现实读者的心情写入小说中：

这时候你还真有点恨起《告别的年代》的作者来。因着那疯汉所隐喻的神秘联系，你对〈左岸人手记〉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与好奇心，极想一读为快。可你却无法阅读一篇从未存在的小说，而偏偏在你的意识深层，因为读过一个虚构人物所写的评论片断，那小说竟然就有了一种“存在过”的意义。存在过，而消逝了。⁶⁰

由此可见，本来不存在的、虚构的事物可以因为话语带来的情感影响，进一步地被建构成为人们所相信的“真实”，相信虚构的事物真的存在，或“存在过”。这就延续了第三层叙事以及全篇小说所反映的共同主题：一些所谓的“真实”，其实也是被虚构的话语所建构的吊诡。

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呈现，第三层叙事除了有关于小说中《告》的评论，还有不少部分提及一些时代背景，以及“文坛”上所发生的事，如茅草行动、肛交案件、首相更替、“烧芭”论战等。加入这些现实中的历史事件，目的都是为了让《告》这本虚构的小说与现实挂钩，继续让读者进行反思。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对韶子与第四人的关系的描述。根据预设读者“你”所阅读的《告》，韶子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评论者，第四人所建构的：

还有更让你大惑不解的是，《告别的年代》的作者怎么选择用这种叙述手法去处理韶子的存在？你愈读下去，愈觉得韶子成了附带于其作品之后

相交接、安华案件等马来西亚的历史大事，也有类似“道听途说”的处理，没有庞大的历史叙述，就像“坐在老街茶室里，听过一些老人口述旧埠轶闻”（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33）一般。

⁶⁰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79。

的一个隐性的‘人物’，而她的作品则不完整地分解到第四人的各篇论述中。这是个俄罗斯娃娃的结构，第四人在最外层，告示着层层“内核”的存在，而韶子被重重包裹，变得愈来愈模糊，愈来愈不重要。

至于韶子的“真身”杜丽安，你觉得她独立于这俄罗斯娃娃结构以外。

61

从这一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到，黎紫书除了希望通过历史、虚构与现实的命题，直接探讨虚构与真实的问题以外，也在文学的系统中，在文本、作者、读者、评论者的关系网中，探讨作者的主体性。通过作品与第四人建构出来的韶子，与在夜市摆摊的杜丽安，虽然是同样的人，但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格。而第四人对韶子的评论与注释，甚至已经超越了韶子本人，成为她存在的依据，就好象俄罗斯娃娃的结构，处在中心位置的韶子是否存在，因为最外层的第四人而变得模糊、变得不重要。作者的主体性就在此被消弭了，“真实”是否存在业已不重要。通过这样的关系叙述，在小说真实与虚构的主题以外，黎紫书想要表达的其实是她个人对于书写历史题材的看法与态度。

小说中提到关于《告》的作者韶子的介绍，很多部分影射了黎紫书自己。除了“早逝”的描述不符以外，“早慧”、“早成名”，以及其中关于书写“女人神话”、“对杜撰史料与伪造历史乐此不疲”⁶²等的描述都非常符合黎紫书的形象与生平。因此我认为韶子这个任务就是黎紫书自我形象的投射。除此以外，对比韶子与黎紫书，和韶子的双重身份一样，她除了是作家，也是记者，也是因为她的短篇小说频频得奖而出名，而且，也有许多学者与评论者时常用历史与性别等庞大议题的切入角度来评论她的作品，与韶子相似的地方很多。经过这些评论，黎紫书作品的价值因为其中有历史题材、国族寓言等命题而被大众追捧。如是现象，就如第四人与韶子的关系。这样的对应，就好象在向读者呼唤，别忘了“独立于这俄罗斯娃娃结构以外”的杜丽安：作家身份之外，一个记者身份的黎紫书；在俄罗斯娃娃以外，也是身处俄罗斯娃娃的中心，那个重要的、真实的存在。黎紫书不一定要杜撰历史题材、黎紫书不一定要书写国族寓言，然而，这些，都已融入她的作品，并不是刻意地书写这些题材。在她的写作生涯中，黎紫书试验过种种题材、体裁、写法。

⁶¹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80。

⁶² 同上，页 45。

而在这十余载的写作生涯之后，她亦发出了“我只能是我自己了”⁶³的感慨，认清自己的局限，并觉悟“即便我无力突破，但我却有了把握去直面自身的局限，并在书写中逐步揭穿自己”，因此写了《告》这部长篇小说，为这些岁月留给她的遗物⁶⁴一一进行解说。

综上所述，小说的第三层叙事，目的就是为了解构之前第一与第二层叙事所建构的“真实”。为了进一步混淆虚实，黎紫书突破文本、读者、作者的三角关系，增加了“第四人”，建立了文本、读者、作者、评论者的四角关系。小说中，《告》、“你”、韶子、第四人的关系，使小说的后设结构更复杂，加入更多的“真相”，通过不同面向让读者了解所谓的“真相”根本不存在，一切都是话语的建构。

⁶³ 黎紫书〈后记/想象中的想象之书〉，见《告别的年代》，页 295。

⁶⁴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298。

第五章 结论：告别的一代

513 事件之后，马来人霸权主义从经济、文化等方面被合理化，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由那时起，就处于一种被打压的状态。种族间不同的立场与矛盾，形成张力，使政府与人民对同一个历史事件有不同的看法。黎紫书的《告》书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社会中的故事。

微观的来看，《告》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是在述说关于杜丽安这个家族错综复杂的家族史。然而，若把它概念化来看，这一部以 513 为出发点的“家族史”，实际上是“马华史”。三层叙事分别代表有关马华的历史、处境与出路。

第一层叙事，从一个底层人民，杜丽安的角度叙述 513 这段“黑暗的历史”，再现出在杜丽安的记忆里，513 其实没有长辈所说的那么恐怖，那么可怕，其影响也不如一般历史所记载的那样深远。原本写实的叙事，成为历史元小说中的一部分，结合第二和第三层叙事，展开虚构与现实间的拉扯。

第二层叙事，故事主角变成预设读者“你”，正在读着故事中的“大书”，《告》，尝试从这本小说中找到有关自己的一些线索。虚实参半，描写“你”的情感与思想，花了不少篇幅。“你”就好比马来西亚华人，在不断探究自己的身世与身份，当中“你”对“J”的望尘莫及，以及对玛纳的失望，都反映了马来西亚华人在寻找认同时的迷失。

在第二层叙事中，“你”就好像被困在母亲所设置的寻找游戏中，被困在五月花里。论文写作的同时，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在去年获选为台湾《中国时报》2011 年十大开卷好书。黎紫书在接受《中国时报》访问时表示，她心中“理想的长篇”就是聚集不同的时代、意境等等，而她处理的方式便是架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故事是她父母那一代，第二层故事是她自己这一代，她说：“父母那一代充满了故事，我们这一代都被困在国族议题，如同故事主角困在五月花一般，很少自己的故事，只能追寻父母的故事。而第三部分（第三层故事）是评论，更是枯燥、贫

乏。”⁶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一直在寻找，场景一直是在五月花旅馆，而“你”也只能从别人的表情和言语了解“513”的意义。

最后，到了小说的第三层叙事，黎紫书利用“枯燥、贫乏”的文学评论书写方式，使第一、第二层叙事中的主要人物消弭在虚构的叙述中，并通过文本、读者、作者和评论者的四角关系、虚构的文学评论，使原本第一、第二层叙事中的真实不再可靠。

同样是历史题材，黎紫书通过元小说的写作手法，质疑所谓“客观”历史的可靠性与真实性。黎紫书说，第二层叙事中，“你”一直在寻找母亲藏起来的東西，这些就是“父母留下让子女追寻的故事”。当“你”一再找寻不到的时候，便开始怀疑这些东西可能根本都不存在，黎紫书说，“祖辈总说留给你一些东西，有些你找得到，有些你找不到，于是你开始怀疑那是否真实存在。”⁶⁶

从小说封面就开始不断出现的历史符号“513”，是黎紫书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方法：

很多读者以为我的故事说的是五一三，他们很期待，但事实上我什么都没写，就跟这件事对马华的影响一样，好像很重要，但又说不上来哪里影响了自己的生活。⁶⁷

黎紫书就是要借着《告别的年代》这部长篇小说，告诉读者她这种对待马华历史的态度，而她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希望马来西亚华人不要再固步自封，一代又一代地自怨自艾，把自己困在历史的窠臼，无法前进。对于马来西亚华人这样的处境，黎紫书的处理方法就是告别，告别过去，告别“自己”。

后设小说的呈现手法就是黎紫书向往事辞别的姿态。《告别的年代》为这一代的马来西亚华人告别黎紫书谓为“本不属于我的年代”的故事。预设读者“你”在读完《告》这部“大书”之后，有了不同的心态与感觉：

⁶⁵ 2011 開卷好書 BV：告别的年代（黎紫書 X 蔡淑臻），
<http://blog.chinatimes.com/openbook/archive/2012/01/06/1149500.html>（浏览：2012年1月20日）。

⁶⁶ 同上。

⁶⁷ 同上。

读过这本大书之后，你对着城市生出了一种说不明白的眷恋。你开始留意那些被时代开发后又逐渐为时代所遗忘的巷弄，也总会在巴士上注视着那些快要被淘汰的老建筑。你觉得你是认识它们的，就像你认得五月花里的一面墙或墙上的某个涂鸦一样，它们如亘古的月亮般见证了祖先与你的生死兴衰，如今在自身的末世中与你冷然相望。⁶⁸

在读完“大书”之后，“你”对于自己的过去不再执着，反而开始留意身旁的事物，甚至对它们产生眷恋，这就是黎紫书所认为马来西亚华人应有的态度：向历史辞别，不再试图从过去寻找想象中的“自己”，而是从身边的事物寻找归属，寻找真正的自己。

相对于书中的“大书”，黎紫书的《告别的年代》，就如董启章在小说末尾的附录中所说，《告别的年代》是一部“大书”，不是就字数而言，而是就立意而言。⁶⁹黎紫书的这部长篇小说，以虚实互涉的复杂手法，提供了一个深入的思考角度，让读者告别了先辈们所经历的，却不属于自己的年代；让评论者告别了一味书写历史题材的黎紫书；让黎紫书自己告别了不属于自己的“自己”。

⁶⁸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页 289。

⁶⁹ 同上，页 304。

参考书目

文学作品

黎紫书《山瘟》（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

专著

东姑阿都拉曼《五一三前后》（怡保：马来亚通报有限公司，出版年份不详）。

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2）。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编著《马来西亚种族两极化之根源》（吉隆坡：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87）。

柯嘉逊著，杨培根译《513解密文件：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吉隆坡：Polar Vista有限公司，2007）。

黎紫书编著《花海无涯》（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04）。

林春美《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9）。

琳达·哈琴著，李杨、李锋译《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帕特里莎·渥厄著，钱兢、刘雁滨译《后设小说：自我意识小说的理论与实践》（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

全国（马来西亚）行动理事会《全国行动理事会报告书：五一三悲剧》（吉隆坡：全国行动理事会，1969）。

王钰婷《身体、性别、政治与历史》（台南：台南市立图书馆，2008）。

许文荣《极目南方》（士古来：南方学院、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01）。

许文荣《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士古来：南方学院出版社，2004）。

詹姆逊著，王逢振、张永国译《政治无意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学术论文

陈后亮〈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再现政治与历史问题〉，见《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3期。

陈晞哲〈论马华作家的后殖民与移民书写——以黎紫书、黄锦树、张贵兴为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8，未出版的学术论文）。

金进〈日对魔镜幻化人生的阴暗女巫——马华女作家黎紫书小说研究〉，见《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黎紫书〈序：让世界投影〉，见《独角戏》（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

林春美〈在父的国度：黎紫书小说的女性空间〉，见《华文文学》，2008年第4期。

刘务求编译〈大马华人政治状况：五一三事件的影响〉，见《90年代大马政治》（古晋：Impact Management，1997）。

彭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关键词的阐释边界辨析——以黎紫书短篇小说创作为例〉，见《暨南学报》，2010年第3期。

王德威〈黑暗之心的探索者——试论黎紫书〉，见黎紫书《山瘟》（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

王丽亚〈“元小说”与“元叙述”之差异及其对阐释的影响〉，见《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许维贤〈“女人神话”在小说里的演绎——论黎紫书小说集《天国之门》〉，见《华文文学》，2004年第2期。

杨春〈历史编纂元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新方向？〉，见《山西师大学报》，2006年第3期。

朱崇科〈（一）本土的嬗变：从概念纠缠到意识形态集结于文本呈现〉，见朱崇科《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网络资料

2011 開卷好書 BV：告別的年代（黎紫書 X 蔡淑臻），
<http://blog.chinatimes.com/openbook/archive/2012/01/06/1149500.html>（浏览：2012年1月20日）。

访谈录音：“000027 论坛 Talking 访问 黎紫书小姐马来西亚女作家 谈小说 1000218 五 Fri.flv”，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Z48BPrNA0s&list=PLECB41E698D3770A4&feature=mh_lolz（浏览：2011年10月28日）。

告别确凿的年代 – 上海书评-东方早报网,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5/22/608198.shtml> (浏览: 2011年6月29日)。